

# 百年运河史，由此溯流“北上”

——茅盾文学奖作品《北上》从缘起到诞生

全国政协委员 韩敬群 口述 单明明 整理

## 文人逸事

### 鲁迅“不差钱”

顾燕

在人们的印象中，知识分子大多以教书、编书为业，收入不高，一般都很穷。鲁迅是不是这样呢？答案是否定的，鲁迅不差钱，或者说是一位基本实现了经济独立的文化人。

鲁迅的收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工资收入、兼课收入、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以及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这里面其他方面都好理解，就是一项“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需要解释一下。资料显示，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零1个月时间，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元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元大洋，折合黄金490两。教育部编译，这是额外的工作，所以鲁迅当然会得到额外的报酬，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有专家更是细致地进行了比较，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这样的月收入，放在现在也是蛮高的了。

收入有保障，生活方面当然也要改善。1923年，鲁迅花了800元大洋买下北京阜成门内的一套四合院，他在上海住的是小洋楼。同时，较高的经济来源也促进了他的读书写作。以购书为例，鲁迅从1912年5月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张，这就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果不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这些文化消费也是难以承受的。

### 刘半农一文改命运

刘建东

1917年，是刘半农命运大转折的一年，细细探究起来，几乎就是靠着一篇文章改变了人生的轨迹。

1912年3月，刘半农与其弟刘天华到上海谋生，在开明剧社任编辑；1913年春，转职在中华书局任编译员。1912年到1916年，刘半农除了做编辑，另外写了多篇言情小说，给当时的出版物投稿，赚取稿费过日子。但1916年寒冬来临之际，报社停业整顿，剧社因故停业，刘半农的编辑工作也走到了尽头，兄弟二人在最困难时，一件棉袍轮流穿着外出，蹒跚在寒冬里。无奈之下，刘半农带着弟弟、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女儿落魄地回到江阴老家，生活非常拮据，只能靠变卖家什和借贷度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这段时间，常州当地豆业老板、开明人士刘润庵在位于焦溪南街70号的刘氏宗祠，创办了新文化实业学校（又称“焦溪西校”），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和新式知识。经常州府中学堂（今江苏省常州中学前身）屠元博校长向刘润庵推荐，

刘半农兄弟于1917年春节后，即赴焦溪西校任教，刘半农讲习新文学，刘天华讲习国乐。

在焦溪西校教书的那段时间，是刘半农人生最为低潮困苦时期。也就是在任教的3个月后，刘半农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之文学改良观》，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发现，便破格聘用仅初中学历的刘半农来北大做预科国文教授。

1917年的7月，既是学校放暑假，又是一学年的结束，刘半农辞退了焦溪西校的教书工作，找到了蔡元培，从此改写了人生的命运。同样是在1917年冬，他试探着在文章中用“她”字，在北京的两家小报上发表，窥探当时人们的反映。1918年1月，刘半农又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成为了《新青年》的四大“台柱”之一。1920年，刘半农赴欧洲深造，初入英国伦敦大学院，在语音实验室工作。

这么看来，刘半农命运的改变，就缘于一篇文章的发表了。

### 陈光甫开创近代旅游业

王荣 王抒滢

1923年，全国首届教育会议在西南边陲昆明举行。银行家陈光甫认为，与会人员一定需要旅行服务，便主动与会议组织者联系，表示可以派训练有素的人员到车站、码头接送，还可以提供舟车、食宿等方面的服务。他向交通部提出申请，要求代售京汉、津浦、京绥、京奉、沪宁、沪杭甬等六大路线的火车票。

1923年8月，陈光甫创办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专门从事旅行及相关业务。旅行部开业后，很快在北京、天津、南京、汉口、苏州、镇江、济南、蚌埠、奉天（今沈阳）、无锡等地成立分部，并将旅客业务扩大到公路、水路和航空领域。旅客只要购买他们的客票，沿途的吃饭住宿与行李托运，都由他们经办。

1924年，陈光甫推出“旅行支票”业务。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旅行支票问世后，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兑现，丢了还可以挂失，因此很受欢迎。1927年6月，陈光甫将上海储蓄银行旅行部正式改组为中国旅行社。1928年1月，民国政府交通部颁发执照，成

为中国第一号旅行社执照。中国旅行社成立后，不仅代售车票、船票、机票，就连上庐山乘坐轿子、游西湖雇用车船、为出国留学代办手续，也在其服务范围之内。

1931年，中国旅行社推出票面为10元、20元、50元、100元四种“旅行便利券”，中、英文两种版本同时发行，在国内诸多名胜景区、各大城市及部分国外城市均可随时兑换成现金，还可享受优待折扣。为了更好地推广“旅行便利券”，凡购买者可获赠漂亮的皮夹子（钱包）等小礼品。

陈光甫以务实的举措提升中国旅行社的服务：规范员工的言行与服务质量；组织各旅游团体，鼓励国人游览本国名胜或出国观光旅行；代办轮船与铁路的货物联运；编印《旅行手册》，创办《旅行杂志》；向旅客提供食宿，在各地设立分社和招待所；与美、英、日、苏等国的旅行社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中国旅行社颇负盛名，钱锺书、老舍等文化名人的作品中常常提到中国旅行社，叶恭绰题写“中国旅行社，导游名山大川”。

### 高士其与科学小品

王剑

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与病毒有着特殊的“缘分”。

1928年，高士其在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实验室做病毒试验时，器皿爆裂，不幸被感染。病毒通过他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大脑，从此给他留下终身不治的残疾。

学成回国后，高士其在刚创刊不久的《太白》杂志上看到一个新鲜的栏目“科学小品”，就好奇地翻看起来。这一看就把他吸引住了，特别是周建人写的《讲狗》一文，让他印象深刻。高士其觉得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文学笔调，撰写浅显易懂、富有情趣的科学短文，确实是一种好形式。受此启发，高士其也拿起笔来，接连写下《细菌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抗敌英雄》《虎烈拉》（霍乱）等文章。高士其原名高仕麒，但在发表文章时却署上了“高士其”。有人问他为什么改名，他解释说：“去掉‘人’字不做官，扔掉‘金’字不要钱。”

高士其的科普作品，集科学性、趣味性于一体，生动形象、朗朗上口，深受文化界的重视和读者的欢迎，许多报刊纷纷约

## 亲历·亲见·亲闻

202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年，一本描写百年运河史的长篇小说《北上》的销量已经将近50万册。这在数字阅读时代的纸质书里，已经是个很高的数字了。

不仅市场充分认可，《北上》出版之后，还获得了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当时41岁的徐则臣成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我经历了这本书从策划到出版的全过程。

### 选题萌发在申遗成功之前

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申遗成功。

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开始了关于大运河的选题策划。一天，我跟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处处长侯健美女士、作家徐则臣在一家咖啡馆聊选题及下一步的创作计划，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写大运河。为何想到写大运河？因为徐则臣可以说是“运河之子”——他在大运河边生活过很长的时间，非常熟悉运河，在此之前，他的创作里运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那么，到底写大运河的什么？我想到一句话：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说过：小说就是民族的秘史。大运河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19世纪中叶，漕运断流，大运河的部分河道几乎被废弃，作用就没那么大了。我们想要通过这条河流的新生，来写出一个民族的新生。那么，大运河这条大河也是民族的秘史，写好它就写好了这个民族的历史。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冯友兰先生将其重述为“旧邦新命”，意为“阐旧邦以辅新命”。我们就是想通过运河写民族的旧邦新命，这样，就基本确定了这部小说的主题。

故事也几乎是当时就确定下来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洋人的北京使馆被包围了，多国部队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意大利人马福德就是其中一位。1901年，时局动荡，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马福德的哥哥保罗·迪马克（外号“小马可·波罗”）为了寻找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沿运河北上。知识分子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师傅、义和拳孙孙氏兄弟等来自底层的人士一路相随，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马可·波罗意外离世。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 与马识途有关的一副春联

马斗全

1983年初，中央电视台、中华书局等单位联合举办迎春征联活动，我也拟联参加了。活动所出上联为“碧野田间得草”，以当代文艺界三个知名人士名字组成，要求下联也为三个人名。

上联的“牛得草”，自然使人首先想到著名作家马识途。但是，“识”与“得”均系仄声，平仄不合，显然不能用。还因为“马”与“牛”太近，几乎属同一类，不宜属对，只好放弃。

后想到作家、诗人叶知秋。“叶知秋”对“牛得草”平仄正合。另拉来电影演员白杨和村里。于是，我投寄的应征下联为“白杨村里叶知秋”。自以为“白杨村里叶知秋”对



### 实地走访，精益求精

也正是在徐则臣开始提笔写《北上》前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拉开了序幕。当时，我提出一个建议：通过运河百年史，写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徐则臣对大运河沿岸的风物、人情、民俗非常了解，但是写运河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写历史；一条线，是写当下。当下这条线徐老师非常熟悉，但历史的这条线还需要下很多功课。徐则臣后来也说：“我以前常自诩对运河比较了解，一闭眼，1797公里的大运河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轮廓非常清晰。但真要写，才发现我们认识的运河其实是望远镜里的运河，要落实到一个个细节，要每一笔每一画交代清楚，望远镜远远不够，还需要显微镜、放大镜。”

大概在100多年以前，大运河上同样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来往于运河，在思考国家前途和命运，他就是清代诗人龚自珍。他于己亥年间（1839年）沿着运河一次南下、一次北上，在这个过程中，他梳理了自己的一生，写了一组315首的《己亥杂诗》。可以说，《己亥杂诗》就是龚自珍的自传，他把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交朋友的经历、感情生活等很多内容都写在其中，表现了一代文人对国家命运、民族存亡的深切忧虑和关切。

我相信同为文人的徐则臣会从前人龚自珍的诗中找到共鸣，这些诗是在大运河之上创作的，可以为徐则臣在创作上提供一些参考，于是专门买了一本《己亥杂诗》送给徐则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也读、他也读，再读一遍，进一步地去了解。

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发现一本书叫《中国的运河》，作者是日本画家安野光雅。这本书是安野光雅的随笔画集，以40幅绝美水彩配优雅文字，用一笔一画，尽显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我看了以后第一时间就给徐则臣老师寄了过去。在此期间，我的一位朋友，是专门研究世界各地运河的，刚从国外回来，与徐老师见了面，聊关于运河的故事。我们还请北京市委宣传部帮忙，邀请国内研究运河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为了写《北上》，徐则臣在4年中阅读了六七十本关于运河的书籍，做了大量的素材准备。同时，他也进行了实地走访，京杭大运河从南到

一个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关心、对国家的关心。

历史并没有留给龚自珍这一代先行者太多时间，但60多年后，这种知识分子立场的博大与悲悯，却穿过时间直抵《北上》的主人公谢平遥的精神深处。对《己亥杂诗》手不释卷的谢平遥，在身世浮沉之时仍努力推动日趋老迈的运河介入浩浩汤汤的世界潮流，同时固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火种，“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跟《北上》的主人公谢平遥和《北上》的作者徐则臣的心理机制是相通的。

另外，书中还引用了《己亥杂诗》的另一首：“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聚今朝。”可以说，《己亥杂诗》对作者的影响是很大的。换个角度来看，一部好的作品，编辑都是不由自主地深度参与到创作之中的。

### 书名“北上”的由来

《北上》历时4年左右写作完成并出版。最终定书名的时候，我说：书名叫“北上”吧？有人提出：有一本书名字也叫“北上”，是一本讲党史的书，刘统老师的。我们也叫“北上”，后来者是不是要避一下？我说：不用。“北上”这个题目挺好的。书中小马·波罗寻找他弟弟的那条船，就从杭州出发，一路北上，所以，“北上”二字符合小说内容。而且，“北上”的“北”，在中国，它不仅仅是地理之北，更是精神之北。“北上”有很多的含义，一方面，它是指向北方；另一方面，在中国“北”往往象征的是中央、中心。杜甫有句诗：每依北斗望京华。《论语》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以，“北”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它也是精神的象征。《北上》是故事的地理走向，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走向。

徐则臣说，尽管对运河感情深厚，但在写这部小说前，从来不敢用“运河之子”的说法：“当我把30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我觉得自己有了资格这么说了，不是因为写了运河，而是因为我为它投入了很多。我把‘运河之子’这四个字放在小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真正认定自己是‘运河之子’了。所有在运河边上生活过的人，只要你认真地对待它，我想，都可以称自己为‘运河之子’。”

### 扉页题词背后的故事

《北上》扉页的题词原来选的是白居易的诗：“事往唯余水，人非但见山。”我跟徐老师说：感觉这两句话太弱了，如果放到前面，有些提不起来。后来，我们从《己亥杂诗》里找到第83首，意蕴、气势与全书非常合拍：“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粟，夜闻邪许泪滂沱。”这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艰的诗人行经运河时发出的自省与悲愤之音。

这首诗好在何处？首先，前两句描摹了运河盛期的景象，船只来来往往，非常繁忙，让读者感受到当时运河的重要作用。后两句的意思是“我（指龚自珍）”作为官员，也是吃着漕船运进大仓的米度日。“邪许”是指纤夫的号子，“我”晚上听到号子，不由涕泪滂沱。实际上，龚自珍是同情百姓，哀民生之多艰的。这是

而“白杨村里”是三一，所以最终还是取了“金山林里马识途”。

罗元贞先生则认为“金山林里马识途”不如“白杨村里叶知秋”，因此还给中央电视台写信指出：“‘白杨’对‘碧野’，比‘金山’好。‘知’字是平声，比‘识’字好。下联全句比一等奖自然而合理。”

那次征联评选，可以说见仁见智，转眼已过去40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些好笑。似这样的文字游戏之联，自己品味比较一番也就算了，当时怎么好打扰几位老先生。

王力、周振甫、罗元贞三位先生均早已作古，他们对一个普通参赛者、无名后生的负责精神，至今想来，仍然甚是令人感动。

只不知当时马识途先生知道这件事否，更不知他认为“金山林里马识途”好，还是“白杨村里叶知秋”好。

（本文作者曾任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

“碧野田间得草”较宜，时间同为秋天，一为野外、一为村内，自然且合情理。

随后公布的征联结果，获一等奖的是“金山林里马识途”。我总觉得，除“马识途”平仄不合外，“金山”一词也显生硬。此外，就生活常理而言，树林里老马识途或马认得树林里的路，只是为对句而对，村中见杨叶飘落而知天下已秋，倒合情理，且还有点诗意。

我虽然心存疑虑，但又恐因偏爱己联而难分优劣，于是便给评阅人员中的名家王力、周振甫二位先生去信，以求得到一个放心的结论，或者教人信服的理由。同时也致信诗联名家山西大学教授罗元贞